

安徽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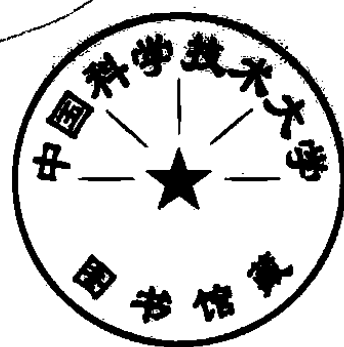
YH 243/26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

(下册)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屠筱武

封面设计 董伯信

书号：087

定价：0.65元

（内部发行）

六安新华印刷厂印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国民党统治下的安徽

-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田世庆(1)
李本一擅入南京“劫收”始末……………陈葆经(16)
杭立武竞选“国大”的经过……………陈君健(20)
高长柱竞选“国大”的丑剧……………陈葆经(27)
“皖浙赣边区”计划的破灭……………詹寿楨(32)

安徽三年游击战争

- 回忆泾青南地区三年游击战争……………朱 农(38)
智杀“常胜将军”胡开武……………青阳县政协(79)
我的一家投身于党的地下交通站……………胡 坚(83)
一支游击小分队的组建和发展……………南陵县政协(91)
回忆龙岗战斗……………徐征发(102)

安徽的地下斗争和起义活动

- 回忆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在解放战争时
期的工作情况……………方向明(108)
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五旅起义前后……………王汉昭(172)
国民党110师起义经过……………赵继武(194)
国民党141师起义始末……………任迂夫(204)
芜湖解放前后见闻……………谢汝祥(215)

补充·订正·勘误

对《刘镇华在安徽的反动统治》一文的补充·····	杨起田(224)
薛卓汉同志等入党时间析疑·····	周 蕙(227)
《选辑》第一至六辑勘误表·····	(229)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田世庆

一、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的解体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1941年1月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反共反人民，特在国民党中央成立最高党政委员会，由蒋兼任委员长，每个大的战略区成立分会，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部门。举凡大的决策，都要经过这个机构的讨论决定，交由地方党政军各部门执行。那时，豫鄂皖边区也在立煌（金寨）成立了这一最高权力机构，由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兼任主任委员。与此相适应，各省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也是由一个人担任。当时的李品仙，既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李宗仁，驻湖北老河口），又是安徽省政府主席（按惯例，兼任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此外，还是第廿一集团军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颐指气使，贪纵骄横，使桂系的势力达到空前膨胀的程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形势来得如此突然，以致国民党当局一时忙了手脚。他们一方面要派大量的党政人员到京、沪、杭、穗、平、津等地接收，同时还要运送大量的军队去东北等地，积极准备内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也日益尖锐。以陈立夫为首的CC系战时

本文作者现任省文史馆馆员。

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他们不能容忍长期以来地方党组织的权力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不利局面，力争党政分开；同时以黄埔系为主体的三青团系统，也力主地方团组织应别树一帜，不能再处于从属的地位（抗战时，地方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由党的负责人兼任）。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浪潮，汹涌澎湃。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决定地方党政分开，三青团主要负责人也由专人担任。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此解体。

抗战胜利后，安徽国民党省党部第一任主委陈访先，东流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此人与桐城的方治、颍上的邵华、涡阳的刘真如，时人称之为CC在安徽的“四大金刚”。陈访先到安徽后，带来了一套班子：委员兼书记长范春阳，桐城人，CC骨干，党棍；委员兼总务组组长吴迪，盱眙人；委员兼组织组组长凌孝芬，定远人；委员兼宣传组组长王枬，潜山人，兼《皖报》社社长；秘书汤启仁，太平人；还有一个农工委员会，由中统特务李仁甫兼任主委，秘书周易，与陈为日本同学。各组都设有专职副组长。

国民党的各级机构，自抗战开始后，即大大紧缩，战后编制仍很紧，整个省党部的工作人员只四、五十人（不包括调查室）；47年党团合并后，由于容纳团方并入的部分人员，总数也不超过六十人。编制这样小，而国民党中央要求各省办的事却不少，结果形成上面来一道公文即照例转到下面去的公文旅行。至于下面是否贯彻执行，是从不检查的，当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了。当时上下似乎都有这样的默契，上面的文件不转，责任在我；转下以后，下面办不办，那是下面的事，与我无关。其结果是公文多，效果小，效率低。

国民党长期居于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地位，但对发展组织、

党员教育、组织生活等，一向不予重视。抗战时，国民党统治地区，有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国民党就利用这个机会，办理集体入党（后来三青团也这样办）。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这样说，抗战时参加国民党的，大部分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参加的。国民党吸收新党员，有两种入党申请书：甲种，需要一个中央委员作介绍人；乙种，需要两个党员作介绍人。我于1940年夏在立煌（金寨）入党时，就是填的甲种申请书。我有一个同乡认识省党部负责人，从他那里拿来几张甲种申请书，要我填一张，由李品仙作入党介绍人（李本人当然根本不知道）。表送上前后，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问过什么情况，不几天党证就发下来，我就是一个国民党员了。当时的国民党员中，既是党员又是团员的，为数也不少，我自己就既是国民党员又是三青团员。战后，这样的训练班少了，甚至没有了。因此，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这段时间里，我省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国民党在吸收党员时，事先既不经培养，入党时又不经过考核，入党后也不进行教育，更谈不到过组织生活。以我自己为例，我自1940年入党后，除在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的区党部参加过两次党员大会外，就从来没有过过什么组织生活。普通党员是这样，身居高位的党员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情况，国民党上层领导也是知道的。1947年秋，张宗良同我谈起他同陈立夫的几句话，很能说明国民党组织涣散情况。张说：“立夫先生，你是中央组织部长，请你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发函全国党员，叫他们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上报，看看能报多少？”陈答：“宗良先生，现在是革命低潮啊！”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丧失一个政党起码的活力，连他们最高组织方面负责人也没有任何挽

回颓势的决心和办法，只有慨叹而已。

战后安徽三青团第一任专职主任是徐君佩，本省庐江县人，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校毕业后，公费留学美国，获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行政院青年训导所副主任（主任康泽），属黄埔系康泽系统人物。黄埔系和CC系是国民党内两个势力最大的派系，矛盾极深，势同水火，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徐君佩一到安徽，就表现了对党政不合作的态度。抗战胜利后，所有省级机关单位，都由立煌（金寨）迁到合肥，但徐君佩却把他的三青团机关搬到安庆（省高级法院和检察处、省邮政局也迁到安庆，因为他们抗战前在安庆的房子都还存在，另当别论）。他在任三青团主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南京，而将三青团的工作委托给一个书记处理。因此，在此期间组织发展很慢，基本上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水平。徐的工作班子基本上是康泽系统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出身的。书记章某，桐城人，武汉大学毕业；第一组（总务）组长吴东，潜山人，军校毕业；第二组（组织）组长钱志诚，“青干班”毕业；第三组（宣传）组长许向渠，桐城人，“青干班”毕业。

当时全省三青团员8万人，县级分团32个，学校分团10多个；在安庆，还成立了一个妇女分团，由徐君佩的老婆卢孰竞任主任。各县分团主任绝大部分都是“青干班”毕业的。

以上是抗战胜利后，党政分开最初一段时间安徽党团的基本情况。

二、张宗良出任省三青团主任

1946年7月，三青团在庐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张宗良

以团中央干事身分出席了大会。大会结束后。受命出任安徽省三青团主任，以取代徐君佩（这时三青团中央干事长已由陈诚取代张治中）。张任命的发表固然表明徐君佩在安徽的工作不能使团中央满意，而要以张宗良来换马；同时也表明陈诚在全国范围内正抓紧培植自己势力（张是陈诚一手提拔的）。但对张宗良本人来说，这个任命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喜悦。他平时不大看得起搞“组织工作”（党团工作）的，认为那些人都是说空话不做实事的人。他曾同我说过，决不搞组织工作。可是，这次他却不得不搞组织工作了，因为这是陈诚的意图，他是无法拒绝的。当然，他在接受任命之后，也有他的打算：既然不干不行，那就好好干一下吧，在青年中打下基础，不但对陈诚将来接蒋介石的班有利，对自己将来竞选安徽省长也是有利的。这样决定之后，即对省团组织的人事进行精心安排。除书记一职，已在庐山决定由谈成荫（舒城人，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毕业）担任外，提出郑纯青、丁培鑫、李家焜、裴功森等为省团干事会干事。这样，新的干事会组成人员是：张宗良、谈成荫、汪少伦（教育厅长）、桂丹华（安徽大学教授、训导长兼三青团安大分团主任）、刘迺敬（安大教授）、郑纯青、丁培鑫、李家焜，裴功森。同时还决定由我担任省团秘书，崔冬芳（河南人，为张办理皖南行署移交时，工作很“出色”，得到张的赏识）为第一组组长，江世禄（旌德人，北京师大毕业，为胡适之的堂内侄）为第二组组长。因为他们两人都不是团员，临时填了入团申请书，由三青团中央发了团证。以上这些任命，很快就得到三青团中央的批准。在安排人事的同时，还提出增建地方分团的申请，除已成立的32个分团外，凡未建立分团的县，一律建立分团；并在安庆、芜湖、蚌埠三个市建立

工人分团（安庆由原妇女分团改建），在省会合肥建立省会分团。这个申请也很快得到批准。我们一行于1946年10月初由芜湖去安庆，徐君佩委托书记章某办理移交。谈成荫于11月初到达安庆。张宗良不久也由南京到了安庆，为新增建的地方分团人事进行安排。张宗良在安徽三青团的干部，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张自己的同学、学生、亲信，这类人占比重最大，无论是省团或地方分团都是这样；二、原“青干班”毕业的。这类人为数不多，但对团的业务熟悉，能量较大，张对这类人始终心怀戒备，不十分放心；三、蒋经国系统中央干校研究部毕业分配来皖的，这类人为数也不多，水平较好，张为了结好于蒋经国，对这类人基本上都重用了（如陶芳田被任命为省团第三组组长）；四、省内外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经张考核认为能力较强，并忠实可靠的，这类人占的比重也较大，特别是新建的地方分团负责人中，绝大部份都是这类人。

在上述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张即提出下一步工作设想——积极扩充安徽三青团的组织，把大量青年拉入团内，计划将全省团员人数由已有的8万人增加到29万人。这个数字，在当时确乎是有些惊人的。张宗良野心勃勃，大力鼓吹计划能够实现的“有利条件”，并于1947年春先后在安庆、芜湖、蚌埠三个市召开地方分团负责人会议，来贯彻团的“发展计划”。在这些会议上，张宗良讲话的重点内容是：一、国民党老化了，不起作用了，在人民中已完全失去信仰。积极发展团的组织，是历史的责任，现实的需要；二、必须抛弃过去的士大夫路线（指只重发展地主资产阶级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人物），发展对象主要是在校高中以上的青年学生和所谓“有觉悟”的社会农工青年；三、必须严格组织纪律，加

强对新吸收的团员的“教育”；四、指令各县“都要按照下达的发展计划，保证完成发展任务”。出席会议的人员也都按照张的调子，叫嚷一通“提高了信心”，“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计划”而散场。47年10月底止，全省团员总数已拼凑到16万。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张宗良在他的讲话中，把重点放在以团代党这一点上，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这与他后来准备组织“中国青年团”的组织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张宗良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是否为陈诚所授意还不知道，但陈诚肯定是知道这件事，并且不反对这样做；二、张宗良召开这些会议是在1947年春天，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他在讲话中虽然很少提到共产党，但他所说的“历史的责任，现实的需要”，既有对国民党内部进行夺权的意思，也有对付共产党的意思，这是很清楚的；三、他所说的国民党士大夫路线的思想，触及了国民党某些本质的东西，在当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中还是少见的。他的这个思想，后来有了发展，1949年春，曾由我代他起草一份给国民党中央有关负责人的信稿中，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国民党要想新生，必须彻底抛弃这个士大夫路线，而面向农工和低层知识分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否则是没有希望的，当然这个意见是不能被接受的；而且这同国民党的性质不相容，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如果照他说的办，国民党就要彻底改组，那些当权者就有被别人取代的危险，他们当然是不愿意的。

面对三青团的大发展，以陈访先为首的国民党省党部，表面上当然不好说什么，但背地里却极为不满。因为三青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危及CC系在安徽党的地位。他们除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进行暗中阻挠外，还不断向国民党

中央汇报，认为这样下去，党的力量分散，对“戡乱”建国，殊为不利云云。他们还指责三青团的大发展，是陈诚想利用三青团作为政治资本，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便到一定的时候取代蒋介石。同时还指责张宗良想利用团的力量，作为将来在安徽竞选省长的资本。省党部的这些指责，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陈诚虽然表面上反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但他所反对的归根结底还是CC系的所作所为。而对以黄埔系为主体的三青团系统对CC系的斗争，实际上是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根据陈在国民党的地位以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取代蒋介石仅是时间而已（国民党到台湾后不久，陈诚就当上了副总统，但天不假年，他却先蒋介石病死）。因此，利用三青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个人势力，未始不是他的计划之一。至于张宗良想利用三青团的力量，做为将来竞选省长的资本，则更是大家都知道的。

三、“党”、“团”合并的前前后后

抗战胜利后，由于实行党政分开，各省党部的负责人绝大部分为CC系分子，因而使CC系的势力得到极大膨胀，几乎达到可以左右国民党的地步，虽然以黄埔系为主体的三青团系统的力量，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他们的力量主要在基层，在国民党中央还是敌不过CC系的。CC系知道，如果听任三青团在基层的力量不断发展，对他们是不利的，说不定那一天，这股力量会危及CC系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因此，压抑和削弱这股力量，就成为CC系进行党内派系斗争的主要方针。内部派系斗争是党团合并的主因，促成合并的迅速实

行，则由于外部因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之后，连连损兵折将，损失惨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给南京国民党以极大的威胁；在西北、华北、华东、东北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以CC系为主的国民党上层领导提出了集中力量，“团结统一”，应付局势，准备大选的提议，就很容易得到除黄埔系、三青团系统以外的派系（如政学系、朱家骅系）的支持。1947年9月12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统一党团组织案》，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议案规定：中央、省、县都成立党团统一委员会，由党团双方提出对等的人数，报上一级党部批准成立，具体负责党团统一事宜。同时还规定：一、所有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一律转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统一后的各级党的负责人，一律根据党正团副的原则处理。对于第一点，无疑是团方的一个胜利，团方当然是拥护的，但对于第二点却发生了问题。因为根据当时安徽的具体情况，各县党团负责人总的说来是团胜于党。团的负责人绝大部份都是大学毕业，有一定的工作和组织能力，而党的负责人不是豪绅就是党棍子，在群众中毫无信仰。因此，团方负责人对于他们屈居副职，是不愿意的，纷纷向张宗良提出辞职或要求改调别的工作。张宗良本人屈居省党部副主委，心里也不高兴。论才干，他比陈访先强。当然，他不能说出口，因为这是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为了平息各县团负责人的愤懑情绪，张曾专门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党正团副，乃中央所决定，虽有不尽符合实际之处，亦应执行。况副自我始，全国皆然。尚望兄等体念时艰，努力工作，不负重托，是所至盼。”这封信下去后，名位纠纷，才得以平息。当然，由于派

系门户之见甚深，党团表面上是统一了，骨子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和过去并没有两样。典型的例子，要算团员登记了。根据国民党中央规定，党团合并时，团方应先进行团员登记，并将登记的表册连同团员总名册，在党团统一工作完成之后，立即移交省党部，由省党部审核填发新的党证。这一登记工作，在1947年10月底完成，11月初，各县表册都报送到省团。按照规定，省团应即备文移交省党部，以便填发党证。但张宗良指示有关人员，团员名册不移交。省党部曾多次催促，张始终置之不理。1949年解放前夕，省府从合肥向安庆撤退时，张派专人将这批表册运送到芜湖（解放后，为芜湖市军管会接收）。这件事，我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张要将这批团员名册留在自己身边不移交省党部呢？现在回想这件事，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张准备在他的“中国青年团”成立后，将这批已登记的团员，作为他的新组织的第一批成员。

这里还要说一下党团统一委员会。根据党团双方以对等的人数组成各级党团统一委员会的决定，安徽省党团统一委员会由陈访先、范春阳、凌孝芬，王枬、李仁甫（以上党方）、张宗良、谈成荫、郑纯青、李家焜、裴功森（以上团方）等十人组成，并由陈访先、张宗良分任正副主委。各县由县党部书记长及一名委员（有的县是调查室主任）和团的主任、书记组成党团统一委员会。各级统一委员会都要按照国民党中央的统一布置进行工作。但实际上好多工作都不是通过统一委员会进行的，而是按照原来的系统各搞各的，如前面所提的团员登记就是这样。因此，党团统一委员会，不过是一种形式，实际等于虚设。

整个党团统一工作，在1947年10月底完成。11月初，我同

三青团省团部份工作人员由安庆到合肥，参加统一后的省党部工作。

四、“国大代表”和“立监委”的选举

1947年党团统一前后，国民党先后进行了“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根据国民党的选举法规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均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后者的候选人必须经过国民党提名；“监察委员”则由省议会参议员的参议员选举，候选人也须经过国民党的提名。陈访先参加“监察委员”竞选，在省议会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张宗良则决定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每县一名代表），在他的故乡庐江县也很顺利地当选了（他在竞选时自己没有回去，都是由庐江三青团和一些亲友帮他竞选的）。张宗良为什么不竞选立委或监委，而竞选“国大代表”呢？这是因为立委和监委都是实职，当选以后，就不能担任别的行政职务，而国大代表是虚职，当选以后，仍然可以担任别的行政职务。张宗良是安徽省政府委员，享有厚俸（月薪640元）高位（简任二级政务官），他是不愿放弃的。更重要的是，他不愿离开已经经营多年有一定基础的安徽。根据1948年4月第一次“国大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时，全国原三青团地方负责人绝大部份都当选为“国大代表”这一情况分析，也有可能是出于陈诚的统一“战略部署”。围绕“选举”，CC系和三青团系斗争日益尖锐，他们首先围绕候选人名单问题，开始了第一回合的激烈斗争，候选人名单通过后，接着就是真刀真枪地争夺选票的斗争。就安徽当时的情况来说，三青团方面提出的候选人或支持的竞选人，一般都强于CC系提出

的人，再加上团的基层力量大大超过党方，因而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虽不断出现波涛起伏，但团方总是处于优势和领先的地位。选举结果，团方提出的候选人或支持的竞选人，基本上都当选了；而党方提出的候选人，则有不少落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范春阳了。范春阳在本省搞党务几十年，当时又是党部的书记长，他和徐君佩（原省团主任）在一个选区竞选立委。结果徐君佩当选而范春阳落选，甚至在范的故乡桐城县，徐君佩的选票也远远超过范春阳。只是因为后来在CC系的把持下，国民党中央重新规定，凡提名为立委候选人的，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一律作为当选（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的所谓选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范春阳才得以捞个立委的牌子。张宗良在选举结束后的一次会议上踌躇满志地说：“这次选举，是团的力量的一次胜利检阅，也是所有从事团的工作的同志一年多来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最高报酬。”

立监委选举结束后，以陈访先为首的CC系在安徽的党的主要负责人，于1948年3月底相继去南京开会。张宗良这时以安徽省党部副主委兼安徽省政府建设厅厅长。他在去南京出席第一次“国大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后，不久就回合肥。这时安徽党务，实际陷于停顿状态，三青团系和CC系的斗争也暂时停止。

五、关于“中国青年团”

“中国青年团”这一名称，对安徽人来说是陌生的。不仅如此，甚至和张宗良共过事的除去极少数核心人物而外，对这一名称也都是陌生的。但它确实确实是一个政党的名称，